

古代丝绸之路 胡商活动及其影响研究

GUDAI SICHOUZHILU HUSHANG HUODONG
JIQI YINGXIANG YANJIU

李瑞哲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古代丝绸之路胡商活动及其影响研究

李瑞哲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丝绸之路胡商活动及其影响研究 / 李瑞哲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24-09656-9

I. ①古… II. ①李… III. ①丝绸之路—商业史—研究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4910 号

古代丝绸之路胡商活动及其影响研究

作 者 李瑞哲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15.75 印张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24-09656-9

定 价 30.00 元

自序

自汉代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胡商在中国的踪迹屡见于史籍。可以说，追逐商业利益是胡商东来西往的一个主要因素，由于路途的遥远和艰险，他们一般以商队的形式奔波于丝绸之路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亚与中原的民间交往进一步得到加强，大量商人陆续来华。《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成帝时，康居“其欲贾市为好”，由于西汉政府为来往商旅沿途提供食宿，以至于“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驴橐驼食，皆苦之。”这些频繁来往的粟特人，除了官方使节以外，必然有许多民间商人。

粟特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经商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也为中古时期东亚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迁居亚欧大陆各地，与其他诸多民族融合，从而成为后来许多新生民族的来源之一。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同样有大量的粟特人进入中国，他们有的来往大批胡人越过广袤的沙漠来向东进发，他们不仅带来了珠宝、香料，音乐、舞蹈，还带来了五彩缤纷的宗教信仰。宗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发挥的社会作用虽然有所不同，但宗教问题关系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它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出土的西安安伽墓、史君墓，流失国外的 Miho 美术馆北齐石棺床，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中都有关于商队运营的场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像学的资料。另外，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给我们提供了粟特人经商的详细情况，甚至在敦煌、龟兹等地的一些石窟中也常绘有与中亚、西亚商队有关的壁画。通过对这些考古材料的分析，结合文献材料，对商队的行走路线进行跟踪，并且揭示商队在丝绸之路行进途中的活动情况，进而对其商队的规模、主要参与者进行论述。

要对胡商的经商活动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必须对“胡”与胡商的概念进行界定，主要论述不同历史时期“胡”的所指有所不同，必须对这一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另外，胡商所包括的民族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对胡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分析也是很有必要的。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北方墓葬中，常出土有骑驼或牵驼、牵马胡俑，还有载货驼俑、马俑、驴俑等一系列陶俑的组合，这些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向我们展示了丝绸之路上商业活动的繁荣景象，表现了墓主人对他们曾经经商的经历难以忘怀，是他们记忆中抹之不去的情结。胡俑的艺术形象最直接地表现出魏晋以来中原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理解。这些出土的陶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通过对这些陶俑进行分型、排列，证明它们与商人经商的场面有密切的联系。

由于在丝绸之路上是远距离运营，路途风险很大，加之古代丝绸之路上经常有盗贼出

没,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商队。但是,尽管这样,仍然会遇到危险情况。古代商队在丝绸之路上的行走路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粟特人是古代最活跃的商业民族,通过对粟特人经商的行走路线进行跟踪,观察其商队在途中的行进和歇息情况,并通过分析论证,发现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是一种民族成分多元化的混合型商队,有时商队的规模是庞大的。

中亚、西亚等国家与中原王朝的贸易方式主要有朝贡贸易和民间互市贸易两种形式。本文通过对中亚、西亚等国的朝贡记录进行梳理,旨在说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与西方诸国的经济交往的频繁,并且还对胡商的民间商业贸易活动进行分析,讨论这些入华商人在中原的活动特点。根据出土的考古学材料和文献记载,发现商人在从中亚通往中国内地的沿途要道以及贸易目的地设置聚落,并引以为据点组成商队进行贸易活动。对此,从北朝时期开始,中央还专门设置萨宝这一官职,对胡人聚落进行管理,聚落带有一定的自治性质。到了唐代,对聚落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入华粟特商人进行贸易活动,必须持有政府所发的“过所”才能顺利进行。

通过出土的实物资料、吐鲁番文书以及文献的记载,发现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经营的商品,主要以奢侈品为主,具有体积小,便于携带而价格昂贵、利润率高的特点。胡商除了进行丝绸贸易外,还进行了奴婢、骆驼与马匹的交易。丝绸之路中国境内发现的一些带有异域风格的器物以及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与胡商的商业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胡商在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同时,也传播语言、艺术、技艺和宗教。随着异域物质文化的传入,异域精神文化也随之传入,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三夷教”在唐代曾兴盛一时。僧侣进入中原是伴随商业活动,或者说在商业活动的带动和影响下,进行宗教传播活动的。另外,商人在经商的同时,也将中原文化传入了中亚地区。东西方之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交流,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商业活动这一媒介而进行的。通过对入华商人的宗教保留情况和文化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来说明他们的经商活动在促进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笔者拟采用将考古材料结合在实质问题中加以论述这种方式,看看哪些问题还具有研究的空间,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将一些文献中没有记载的细节显现出来。

李瑞哲

2010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1)
一 研究目的	(1)
二 研究意义	(2)
第二节 研究现状	(3)
一 国外研究	(3)
二 国内研究	(4)
第三节 研究思路	(6)
第一章 有关胡商概念的界定	(8)
第一节 “胡”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	(8)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胡商概念的界定	(13)
第三节 胡商与丝绸之路	(16)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上的胡人	(20)
第一节 文献记载中的胡人活动情况	(21)
第二节 石刻以及敦煌文献中的胡人	(28)
第三节 胡人的经商背景	(41)
第三章 入华胡人石质葬具	(45)
第一节 胡人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45)
第二节 石 椁	(46)
第三节 石棺床	(49)
第四节 墓 志	(54)
第五节 石质葬具所反映的胡汉文化交融	(58)
第四章 与胡商关系密切的陶俑和石窟壁画中的胡商图	(64)
第一节 陶俑与胡商	(64)
第二节 石窟壁画中的胡商形象	(75)
第五章 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	(84)
第一节 行走路线——以粟特人为例	(85)
第二节 商队的首领	(100)
第三节 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	(106)
第四节 商队的规模及其参与者	(115)
第五节 商队的交通运输工具	(122)

第六章 胡商的贸易活动及其交换手段	(125)
第一节 胡商的两种贸易形式	(125)
一 朝贡贸易	(125)
二 民间贸易	(128)
第二节 主要交易品	(138)
一 丝绸	(139)
二 贩卖奴婢以及胡商在大唐西市的交易活动	(143)
三 马匹、骆驼交易	(151)
第三节 器物	(156)
第四节 钱币	(161)
一 萨珊银币	(161)
二 拜占庭金币	(163)
第七章 宗教	(167)
第一节 宗教与商人	(167)
第二节 祆教	(172)
第三节 摩尼教	(182)
第四节 景教	(193)
第八章 文化与习俗	(200)
第一节 绘画	(201)
第二节 胡乐	(204)
第三节 胡旋舞	(210)
第四节 泼寒胡戏	(216)
第五节 髻面	(218)
第六节 胡人饮酒习俗	(221)
结语	(227)
参考文献	(229)

前 言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墓葬中，常出土有骑驼或牵驼胡俑，牵马、牵驴胡俑，还有载货驼俑、马俑、驴俑等一系列陶俑的组合。从出土的牵驼俑、载物驼俑等来看，是对古代丝绸之路上经商活动的一种真实写照或再现。敦煌、龟兹石窟壁画中也常有表现经商的场面。近年来，虞弘、安伽、郭里木吐蕃墓、史君墓等墓葬出土的一些有关反映商队的场面，更是为我们研究入华胡商的活动情况提供了直接的图像资料。

一般来说，商胡的商业活动包括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两种形式，到中原王朝的贡使是在朝贡形式下进行的官方贸易。各国到中原的使节，一般都要进贡方物，中原王朝对各国使节相应地馈赠丝绸彩帛、金银精器等礼品。这里的“方物”和“礼品”实际上就是商品，“进贡”与“馈赠”实质上就是一种国家贸易，而各国贡使带来的方物多为高级奢侈品。另一种形式是大量的民间贸易，即组成商队长途贩运。通过对中亚、西亚等国家的朝贡进行梳理，可以看出中原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的频繁程度。

胡商活动形成了广大的地域交易圈，导致人口、物质、文化方面的流动，随之产生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往往形成一些大小不等的聚落，有聚落就会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必定留下一定的文化遗存。具体有哪些遗存？他们的商业活动是怎样进行和展开的？远离故乡的他们原有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保存状况如何？胡商的规模、交通工具、主要交易品以及交换方式，由商业活动而产生的文化交流以及对中原王朝的影响怎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毫无疑问，中国的丝绸是东方输往西方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但是在这条贸易之路上交易的还有其他种类繁多的货物，包括从东方运往地中海的贵金属和宝石、瓷器、香水、纸张、装饰品和香料等，以及运往东方的棉花、纺织品、玻璃、红酒、琥珀、地毯等。此外，还有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出产的优良马匹也沿此线路销往东西方。

不仅货物沿丝绸之路流通，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传播到远至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土库曼斯坦等地区。通过丝绸之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从地中海，祆教和摩尼教从波斯传入中国。此外，科学技术成就也通过丝绸之路得以传播：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冶铁术、弩箭、指南针和瓷器传到了西方，同时西方的工程技术（尤其是造桥术）、棉花种植和加工、挂毯织造、天文历法、葡萄种植以及玻璃和金属加工技术传入东方。此外，医药知识和技术、水果和谷物种类的交流与传播也十分频繁。

二、研究意义

胡商的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胡商在丝绸之路经商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笔者经过对胡商在丝路上商业活动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这一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深入程度不够。胡商来华，对古代中原地区与西方的经济、文化等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古代东西方的交流离不开丝绸之路，尤其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对有关胡商的材料进行归纳和梳理，可以进一步细致和准确地了解古代丝绸之路上商人的活动情况。

正如有学者指出：“特别是当我们进一步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很惊奇于我们知道的关于商业方面的情况很少。谁来实现这种贸易，他们怎样进行操作，除了丝绸之外，他们还交易什么样的货物，而这些却仍相对地不太为人们所了解。幸运的是，吐鲁番发现的银币和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机会，来获取对于6世纪晚期到8世纪早期亚洲内陆商业较为深入的认识。这些钱币和文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商人身份、他们进行贸易的货物类型、他们活动的时代和地区以及他们与吐鲁番地方经济的关系等方面的信息。”^①

为得到中国的丝绸，粟特商人甚至参与了具有高额利润的贩卖人口的交易。从唐代诗歌中，得知很多粟特女奴被卖到洛阳和长安酒家，俗称“酒家胡”、“胡姬”。由于文献没有记载她们的来历，以前一直不清楚这些“胡姬”因何远离故乡，流落到长安等地。吐鲁番粟特文买婢契的发现为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证据。除了以丝绸交易为大宗外，胡商还主要参与了马匹、骆驼等交易活动。

关于胡商来华的原因，归因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人们的生活需要以及商业利益的诱惑。从两汉时代起，中国的丝绸就已经成为丝路贸易的主要商品，这种轻质高利润的商品一开始就为丝路贸易注入了活力。古代罗马没有有关中国商人经商的记载。同样，在长安也很少有罗马商人。西方文化在古代传入中国，或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主要是通过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媒介作用。交易活动导致了大量的胡商包括粟特人、波斯人在西汉以后涌入中国，同时也带来了异质文化因素。

中原王朝历来实行重农抑商、胡汉有别的政策，严禁汉人经商，这就为粟特人垄断丝路贸易提供了机会。对待胡商，明文规定，胡人一经来华就不得归蕃。这就使得大多粟特人希望成为附籍或客籍，用以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愿籍为编户之民。本文将利用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胡商经商活动的特点，来对其进行剖析，找出其中的原因。

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胡商的问题，尤其是荣新江先生和张庆捷先生的文章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并给了笔者一定的启发，而国外学者对粟特文古信札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对商队首领萨宝的问题目前还在进行着讨论、研究。笔者将通过已经发现的有关胡商的考古学资料，对古代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经商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跟踪他们的经商过程和与之有关的一些活动，力争对来华胡商在魏晋至隋唐这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这对于揭示古代入华商人在丝路上的活动情况，再现那段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① [美] 斯加夫：《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它们与国际贸易和地方经济的关系》，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合办：《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19页。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

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经商活动以及因商业往来引起的在欧亚文化交流中的地位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由于以“昭武九姓”为主的胡商的故居在泽拉夫善河流域和河中地区，对粟特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已形成了一门学科——粟特学，其中以俄国、法国学者在粟特学研究领域中成就卓著。国外有关丝绸之路胡商的研究，主要是在研究丝绸之路或与粟特人有关的问题时附带上的，以法、德、日研究较多，但材料翻译过来的很少。其中法国学者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的《丝绸之路》，在第七章中谈到了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等商贩民族^①，在第十二章中谈到了粟特商人，并指出他们是商贩和艺术家的国家^②，在第十三章还谈到“三夷教”问题，但没有具体地论证商人在华活动的特点。美国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伊朗与中国》（Sino-Iranica）一书对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还对中亚的纺织品和矿物质的传播进行了论证，探讨了东方名物、语言、制度各方面的问题，认为这些都是商业活动的结果，但该书只是从商品交流方面来论证，没有涉及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运营情况。英国学者赫德逊（G·F·Hudson）的《欧洲与中国》概括了以前欧洲学者对中西古代陆路交通史的研究成果，并对中西关系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这样写道，“起初，他们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通过传闻和间接贸易中的商品交流才相互认识。”^③虽然书中第三章专门论述丝绸贸易，但没有对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细节进行研究。美国学者谢弗（Edward Schafer）著、吴玉贵译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又名《撒马尔干的金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主要以物质文化交流为主。法籍伊朗人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原书第三编译注了有关波斯、中国、希腊和罗马的史料，原书第四编主要讨论了丝绸之路西传的中国谷子、高粱、樟脑、桂皮、生姜、水稻、麝香和大黄的栽培史、用途以及经波斯传向西方的过程，主要是植物方面的交流情况^④，没有对胡商交易的一些特点进行细致的讨论。

1907年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附近 T. x11. a 号长城烽燧遗址获得八封粟特文古信札，其中第二封和第五封属于商业文书，尤其是第二号古信札，学者曾经对其年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2002年11月，在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召开了“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 Williams）《论粟特文古信札的再刊》一文，对第一、三号信札进行了释读，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粟特文“Pirōik”来源于于阗文，意为丝绸，用以说明印度与大夏对粟特

① [法] 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80—87页。

② [法] 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161—175页。

③ [英] G·F·赫德逊著，李申、王遵仲、张毅译，何兆武校：《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

④ [法] 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商业的影响。法国学者魏天义 (Étienne de la Vaissleré) 的《粟特商人史》(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Leiden, Boston, 2005.) 是一部研究粟特商人发展史的著作。美国斯坦福大学丁爱博 (Alberb Dien) 《帕尔米拉的商队及商队首领》一文, 将帕尔米拉地区与中亚及中国地区的粟特人相比较, 认为前者可能是一个货物中转中心, 后者多是小商贩贸易,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依靠商队把他们带到目的地。^① 辛姆斯—威廉姆斯 (N. Sims—Williams) 《中国和印度间的粟特商人》一文, 利用粟特文资料, 揭示了粟特人不仅是中亚和中国贸易的中间人, 也是印度与中国之间贸易的中间人, 并且还论述了粟特文古信札所反映的粟特商人贸易及宗教活动的情况。

吉田丰的《粟特语资料所见粟特人的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1《中央欧亚大陆的统合》, 东京: 1997年) 一文利用粟特文资料, 论述了粟特人在东方的活动及其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 还利用了有关佛教粟特语方面的资料, 对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进行了分析。日本大阪大学荒川正晴的《粟特人的移民聚落与东方交易活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5《商人与市场》, 东京: 1999年) 一文,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简要叙述了粟特移民聚落的形成过程和丝绸之路沿线分布情况, 还对北朝和隋代粟特聚落的构成、规模、作用、形制, 萨宝官职的变化, 以及唐代粟特商人在中原的贸易活动进行了分析研究, 作者主要是通过历史角度来分析论证的, 实际上, 粟特人的聚落发展演变与萨宝的性质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荒川正晴 (Arakawa Masaharu) 的《唐代粟特商人与汉族商人》一文, 根据吐鲁番文书, 指出唐代粟特商人与汉族商人始终保持密切的关系。《唐帝国与粟特人交易活动》一文分析了粟特商人来唐朝贡的性质, 并利用吐鲁番文书, 阐明外来粟特商人入境、交易的情况, 还从律令制的角度, 把粟特人看做是唐朝羁縻州府的百姓, 指出他们与南北朝时期作为外国人的粟特商胡不同, 从吐鲁番文书可以看出, 粟特商人来唐朝内地交易活动的展开, 是唐朝在粟特地区设立羁縻州府以后的事。^②

美国学者斯加夫 (J. K. Skaff) 《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它们与国际贸易和地方经济的关系》(《敦煌吐鲁番研究》卷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论证了银币在吐鲁番地区是作为钱币使用的, 而不是商品, 是粟特人、波斯人从西方带来了这种习惯。英国学者苏珊·怀特费尔德编的《丝绸之路——路线、旅行、战争和宗教信仰》(The Silk Road: Trace, travel, War and Faith.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2004.) 收集了很多学者的关于丝绸之路方面研究的论文。

二、国内研究

近20年来, 我国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在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2002年11月,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召开了“古代中外关系史: 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粟特人及祆教的新史料介绍是研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张庆捷先生的《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一文, 通过墓葬中出土的胡商俑、墓葬和石窟壁画中的胡商图以及敦煌吐鲁番的有关反映胡商的文书, 论证了胡商的运输方式、工具、品类等问题。

^① 此次会议的论文后来由法国外交部赞助, 以《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新探索》的书名在《法国汉学》第十辑上发表, 参见《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荣新江、华澜、张志清主编:《法国汉学》第十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年。

^② [日] 荒川正晴:《唐帝国与粟特人交易活动》,《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

2004年4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又召开了“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历史、语言新探索研讨会”,这次会议展示了近年来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新粟特文物及文献资料,并报告了我国学者近年来关于粟特人与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萨宝以及贸易方面有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军凯的《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图像初探》,北京大学荣新江的《萨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队商首领》一文系统收集了龟兹、敦煌石窟壁画上的萨薄形象,并从萨宝与萨薄的关系角度加以论证,揭示了佛教壁画中萨薄或其所率印度商人在龟兹和敦煌地区向粟特萨宝和商人转化的过程。

姜伯勤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主要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详细分析了西州著籍的粟特人和未著籍的粟特胡商,认为西州的崇化乡与沙州的从化乡性质一样,是著籍粟特人组成的聚落。荣新江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论述了胡人聚落、胡人与中古政治以及“三夷教”的流行问题。《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作者通过史君石椁等图像上的粟特商队,论述了商队的规模、种族构成、人员构成、运载工具和运营方式等,但主要是以粟特商人为主加以讨论的,未涉及墓葬中出土的牵驼胡俑、载物驼俑及其它们的组合关系。

陈连庆的《汉唐之际的西域胡贾》(《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商在河西走廊的活动进行了分析。另外,专门对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活动进行研究的有程越的《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王尚达的《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陈海涛的《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尚衍斌的《唐代入华“兴生胡”的社会权益评析》(《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对奴婢买卖活动进行研究的有芮传明的《唐代“酒家胡”述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2期),林梅村的《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的9期),温翠芳的《唐代长安西市中的胡姬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这些论文都讨论了粟特人的经商活动以及对中原王朝产生的影响,时间仅限于唐代,很少涉及其他参与古代丝路贸易的民族。

程喜霖先生的《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后收入作者《唐代过所研究》一书),利用吐鲁番新出土文书来研究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但没有利用墓葬出土的有关入华商人的材料。赖存理的《唐代“驻唐”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待遇和生活》(《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其论文的时间范围仅限于唐代,是从历史角度进行论述入华商人在华的权益和活动情况。范邦谨的《唐代蕃坊考略》(《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对唐代长安城的外国人的居住区进行了研究,主要对唐代长安城外胡人的居住里坊进行论述,而缺少对胡人的商业交易活动方面的分析。另外,还有一些主要利用《太平广记》中的胡商材料,仅仅从文学角度出发,来讨论唐代胡商形象的论文。^①

^① 阳旭:《从〈太平广记〉看唐代商人》,《广州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专辑)1990年增刊;韩瑜:《从唐小说中的胡商看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张剑:《胡商·胡马·胡香——唐文学中的外来文明和唐人精神品格》,《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析侠:《陆上丝绸之路与汉唐边贸事业》,《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吕庆志:《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薛平栓:《论唐代的胡商》,《唐都学刊》第10卷,1994年第3期;程国斌:《论唐五代小说中的胡商现象》,《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张梅:《丝绸之路上的汉唐丝绸及丝绸贸易》,《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0年第2期。

第三节 研究思路

丝绸之路的空间概念很大,延续时间长,本研究抓住丝绸之路上的胡商活动这一问题,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路线,即陆路丝绸之路,将时间放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段时期,与丝绸之路的大背景联系起来,主要抓住胡商这一问题来加以突破,具体的内容则是研究胡商的活动特点。这是因为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陆路丝绸之路的材料相对集中一些,保存下来的有关胡商的遗迹较多一些。这就要求首先对胡俑、胡商俑的概念进行界定。胡俑为中原统治区域内的各民族以及与中原王朝毗邻的各国人民形象,深目高鼻、络腮胡须,他们各自所具有的特点反映了来自不同的地域和国家,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情况。丝路贸易也是由多个民族参与的,主要是粟特人、波斯人、突厥人、大食人,他们以中间商的形象存在。从出土的牵驼俑、载物驼俑等来看,是对他们经商活动的一种真实写照或再现。胡商的组成、规模以及民族成分构成,一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安伽、史君墓以及其他墓葬的图像中所反映的商队人数不是很多,但经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商队是由多种成员组成的,而每个成员都代表着商队中的不同民族成分。

本文的研究并没有超出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围,而是在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通过出土的有关反映胡商的资料,具体地与丝路贸易联系起来。进入20世纪,随着敦煌文书的发现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的发掘,出土了许多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有关胡人经商的文书,这些对于研究胡商的经商活动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对几件典型的吐鲁番出土的胡商文书进行分析,探讨古代来华商人的经商特点。近几十年来,在北方地区发现了大量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玻璃器、金银器、波斯银币、罗马金币等,有些玻璃器皿还出现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上;墓葬中出土了许多有关胡商的器物,如金银器、玻璃器等,是来自中亚的器物,只需说明这些外来物品的输入与吠哒、粟特、波斯等胡商的活动有密切关系,并不要求对出土的金银币进行分类或者对器物的性质作更细的探讨。对于墓葬中出土的有关反映胡商的胡俑、牵驼俑组合、器物、金银币实物等,以及石窟壁画中的有关经商的场面以及一些最近发现的粟特人墓葬石椁上的图像学资料,本文主要利用这些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研究入华商人的活动情况,主要包括胡商的行走路线、规模及构成、交通工具、主要交易品、路途中的危险情况以及宗教信仰保留和文化传播等问题。

大量的胡商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中国内地活动,一般来说,商胡的商业活动包括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两种形式,到中原王朝的贡使是在朝贡形式下进行的官方贸易,这种贸易形式反映了其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密切的经济联系。另外,除了贡使贸易外,民间的经商活动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对民间贸易进行分析论证,可以确定入华商人的活动特点。

汉人墓葬出土的胡俑或胡商俑,表现了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由于汉人崇尚这种社会风气,这可能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关于外来胡人俑形象与中原王朝统治下的胡人俑形象,其关系较密切。对于胡商国别的鉴别则主要根据所发现的图像学的资料,结合服饰、面貌等方面,根据文献记载,加以区分。

既然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很多聚落,那么其首领问题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佛经中出现萨薄出海经商的故事,萨薄这一名称传入中亚后,可能在这一地区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后来经过商业民族的中介作用而在丝路上流行起来，影响了内地，在中原王朝，专门设立这一职务对胡人居住地区进行管理，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官职。

宗教、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胡商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能说宗教、经济、文化的交流完全是由胡商来完成的，他们只是积极的参与者，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像西域、中亚的其他古代民族一样，他们都参与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活动。

第一章 有关胡商概念的界定

胡有广义、狭义之分，很难把握，古代对少数民族的称呼还有夷、蛮、戎、狄，这四个字只有与东、西、南、北等方位词组合使用时意义才能明确。除此之外，还有将少数民族称为“蕃”，蕃有时具体指某一民族，可与通称相区别。北方、西域的民族皆可称为胡，其中还包括南方的少数民族，面貌上呈现深目高鼻、须髯浓密形象的人都可以以胡相称。四夷是按照方位对周围少数民族的称呼，分别指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蕃的意思相似。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往往把西域人称为胡，把西域来的商人统称为商胡或胡商，其中包括粟特商人。公元6世纪前后，粟特商人已成为商胡中最重要的成分。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是一条漫长而又艰险的道路，使者、僧侣、商人等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将中原的文化传播到西方，又将西方的艺术、宗教、商品等运到东方。

第一节 “胡”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

胡是一个历史概念，是“我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汉以后也泛指外国人”。^①

“胡”是个不断在演变的称谓。早在春秋时期指称对象是东北以及漠北的少数民族。后来“胡”慢慢变成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如汉代称匈奴人亦是胡人。胡人从指称域内少数民族发展到指称域外如西亚、南亚各国之人，最早可追溯到汉代。《汉书·西域传》卷118中称西域人为“外国胡人”，“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商贾，争分铢。”从这里可以发现“胡”和“商”具有一定的联系。

匈奴自称为胡。《汉书·匈奴传上》记载：“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②冯家升先生认为：“按‘胡’者匈奴之自称，何以知之？盖单于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即为例证。大抵‘胡’系‘匈奴’之急读，皆其自称之辞。其义已由‘胡者天之骄子’一句而知之。”^③“胡人”与“胡”的意思相同，另外，《周礼·考工记总目》记载：“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郑玄注引郑司农曰：“胡，今匈奴。”^④《淮南子·齐俗训》载：“故胡人弹

① 《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84页。

②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80页。

③ 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载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7页。

④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0页。

骨，越人契臂，中国敌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①

战国初期，林胡、东胡与楼烦等北方族群通称为胡。战国中晚期，匈奴兴起后，自称为胡，所以秦汉时期胡指匈奴。如《战国策·齐五》记载：“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② 为了与匈奴相区别，按方位将匈奴以西的民族称为“西胡”，将匈奴以东的民族称为“东胡”，而将一些小的部落称为“杂胡”或“杂种胡”。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既指继匈奴之后称雄于北方的乌桓、鲜卑，也指西域等民族。中原人习惯以“胡”称呼“西域”，汉代称西域诸国为西胡，本来是相对于匈奴与东胡而言的。汉、魏、晋、南北朝时，“胡”也可指包括印度、波斯、大秦等的西域诸国。^③ 另外，晋干宝《搜神记》卷2记载：“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④ 《艺文类聚》卷176引《扶南记》：“顿逊国，属扶南，西出海中，国主名昆仑，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婆罗门千余人。顿逊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进不舍昼夜。”^⑤

对“胡”的来源，一种观点认为“胡”源自伊兰人。伊兰人信仰火祆教，尝考《火教经》语 ahu 一词原具两义：（1）主也，天主或家主；（2）生命也。火教之主帝亦曰 ahura mazdoh。……我国于冠首元音字——尤其是短 a——常省略不译，如是，则 hu=胡。……余由是得一结论曰：伊兰族之称胡人，系因其信奉火教而得名，否则取家主（Hauoherr）之义而得名。^⑥

“胡”原意是北狄之统称，扩大一点，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贬义。在《高僧传》中，胡字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亚夷狄之文。^⑦

隋唐时期，胡特定地指伊兰人，以区别于其他民族。《释迦方志》卷上《中边篇》记载：“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宝主也。地接西海，偏饶异珍，而轻礼重货，是为胡国。”^⑧ 《隋书·康国传》：“有胡律，置于袄祠，决罚则取而断之。”^⑨ 《通典》197《突厥传》记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胡酋康苏密等遂以隋箫后及杨政道来降。……思摩者，颉利族人也。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⑩ 《旧唐书》卷8《本纪》开元九年：“兰池州叛胡攻陷六胡州。”^⑪ 同书92《韦抗传》：“河曲叛胡康待宾拥徒作乱。”《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记载：“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氏，为覼，居突厥中……”^⑫ 《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记载：“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翰素与禄山、（安）思顺不协……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

①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79—780页。

② 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34页。

③ 王立：《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④ [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页。

⑤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94页。

⑥ 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载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页。

⑦ 《季羡林文集》第七卷《佛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

⑧ 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卷上《中边篇》，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12页。

⑨ [唐]魏征等撰：《隋书·康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8—1849页。

⑩ [唐]杜佑撰：《通典》197《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11—5416页。

⑪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2页。

⑫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11页。

也。禄山以思顺恶翰，尝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① 赞宁《宋高僧传》卷1记载：“释跋日罗菩提，华言金刚智。南印度摩赖耶国人也……于帝时（玄宗）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闻智，智曰：‘吾是蕃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去。’”^②

胡究其外延而言，范围很大，北方、西北等民族皆可以归类。《新唐书》卷80《常山王承乾传》记载：“[李承乾]又好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辮发，五人建一落……”^③《旧唐书·西域传》记载：“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王）玄策。”^④《酉阳杂俎》前集卷1《天咫》记载：“永贞元年（805），东市百姓王布……忽一日，有蕃僧乞食……复有一少年……遂扣其门曰：‘适有胡僧到无？’”^⑤胡有时也指南方少数民族。《太平广记》卷476《昆虫》4“陆颙”记载：“有胡人数辈，擎酒诣其门。既坐，颙谓颙曰：‘我南越人，长蛮貊中。’”^⑥《资治通鉴》卷203《唐纪》19记载：“[则天后广宅元年（684）]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叟为昆仑所杀……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胡商诉于元叟，元叟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叟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追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⑦《资治通鉴》卷211《唐纪》27记载：“有胡人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又欲往狮子国求灵药及善医之姬……上命监察御使杨范臣与胡人偕往求之，范臣从容奏曰：‘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姬，岂宜置之宫掖。’”^⑧《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每年至安南、广州的外国船很多，“南海船，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狮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罔入牢狱者。”^⑨再如《宣室志》卷1记载吴郡陆颙自幼爱吃面，因肚子里有异虫，而且愈吃愈瘦。“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颙谓颙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网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文物之光。惟吾子峨焉其冠，檐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愿与子交欢。’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而甲于巨室也。”这段话中的胡人亦明言自己“吾南越人”。^⑩

对于“胡”和“胡人”的理解和认识，王国维先生首先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对“胡”进行了论证。后来，他又在《西胡考》和《西胡续考》中对西胡进行了论证，“汉人谓西域诸国为西胡，本对匈奴与东胡言之，《海外东经》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又云：‘昆仑山在西胡西’，白玉山及昆仑山，即今之喀喇昆仑，是前汉人谓葱岭以东之国越西胡也。……是后汉人于葱岭东西诸国，皆谓之西胡也。魏晋六朝犹袭此名。……西胡亦单呼为胡，《汉书·西域传》中：‘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氏羌行国，逐水草往来。’是所谓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11—3213页。

②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页。

③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64页。

④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7—5308页。

⑤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页。

⑥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76《昆虫》4，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20—3921页。

⑦ [宋]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3《唐纪》19，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20页。

⑧ [宋]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1《唐纪》27，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8页。

⑨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63页。

⑩ 张读：《宣室志》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页。